

改革攻坚阶段理念更为重要

■ 古建芹 河北经贸大学教授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确实进入了攻坚克难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其理念上的问题更为重要，这其中包括我们需要彻底摒弃计划经济的政府主导的思维定式。

从改革开放开始，从理论到各个方面、各个层面，一直强调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要用市场化的理念去指导、引导经济体制改革。但实际上，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隐隐约约，或者是说潜意识里用计划经济的那种思维定式。对于利益的分配，我们觉得它就应该是政府的，就应该是计划经济的，而我们现在要做一种姿态，把这个权利让位给市场，让位给某一个主体。所以，我们应该彻底摒弃市场经济政府主导的思维定式，需要真正使政府能够担当起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的职责，还利于市场主体。同时让地方政府有能力去承担起历史赋予他们的这种责任。

这里实际上就涉及了土地财政。我们很多时候把土地财政看成是一个贬义词，我们说到土地财政的时候，往往把它跟我们说地这些现象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土地财政本身没有问题，它是一个很好的财政制度，我们可以从国际经验上得到这方面的借鉴和提示。很多国家的地方财政就是土地财政，比如说改革后的财政收入是税收，国外土地财政的收入模式是以税收为主，费为辅，而我们现在的带引号的“土地财政”出了问题，是由于我们的收入模式没有选对，所以应该在土地财政收入模式的改革上下大功夫，而在这方面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目前进行的再改革，比如说营业税改增值税，实际上就是既涉及到政府间税收分配的问题，又涉及到产业结构优化的问题，还涉及到地方间利益分配的问题。那么，这里面的营改增实际上就是一个核心和关键，把它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相应的解决。比如说，我们的财政收入分享制度；比如地方税的主体税的培育，培育哪个税种，如何进行培育；比如产业结构调整，如何调整？如何优化？等等。营改增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第三，我们的税制改革一定要注意它的系统性、前瞻性。个人所得税很多人在关注，但我个人认为，像个人所得税这样的改革，实际上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国家法制化的程度，需要再加强。

中国模式与变革

为什么经济模式很重要？如果看一下中国三十多年前和三十多年后的经济发展和成长，你可以看到，当时邓小平做的就是——一件事，把模式改了。

■ 王建国 北京大学教授

改了什么模式？我们叫改革，事实上就是政治体制上没变，经济制度上把原来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第二点，他把两个权利都扩充了。第一是人权，以前你不能自由迁徙，不能自由择业，不能自由创新，这些都放松了。还有产权放松了，尤其是私有财产。

这两个权利的放松，就改变了体制，所有制结构也改变了。但是另外一个限制他并没有改，就是权利还是中央集权。再一个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是来自上层，还有权力之间相互不制衡。他就改了这一个，结果就到了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今天的中国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描述它，它就是中央集权控制下的市场管制经济，它又叫做“全控控制”。

当我们讲到这个经济模式的时候，很难解释到底什么叫经济模式？其实近來我一直在想的就是这个概念。下面我想给经济模式下个定义，什么叫做经济模式呢？可以看成是四个战略的系统组合，或者叫做组合。哪四个战略呢？第一就是价值承诺，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必须对国民有一个价值承诺，这也是从商业模式借用过来的；第二，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对他的国民制度定位，必须给制度有一个定位；第三，就是财富创造战略怎么满足他的价值主张，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GDP的创造战略；第四，就是财富分配战略，实际上就是GDP的分配问题。这四个战略的组合构成了经济模式。经济模式不是战略，而是这四个战略的组合，并且是有一系

经济改革是以企业改革为出发点、突破口，那么企业改革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现代公司制，而现代公司制基本的游戏规则，就是现代公司治理。

中国改革要树立正确的治理理念

■ 李维安 东北财经大学校长、教授

从治理这个角度看，事实上中国现在深化改革，所谓的深水区改革的攻坚，实际上是一个制度的改革。经济改革是以企业改革为出发点、突破口，那么企业改革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现代公司制，而现代公司制基本的游戏规则，就是现代公司治理。我们发现，治理总体的路子就是从行政型治理往经济型治理走，OECD的治理评估也有这么一句话。

行政型治理有三个要素，资源配置的行政化、经营目标的行政化、高管任免的行政化。所以你再改，改不下去了，因此必须倒过来由上面开始，因为你是服务型政府，或者服务型政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不光是公司治理的问题了，我们的非盈利组织如红十字会出问题，结构不顺畅；我们的上市公司出问题，证券市场出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官商结合。现在的交易所也要改成公司，而且准备要上市。包括大学这种非盈利组织，现在看来也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很多大学都在制定大学章程。当年在谈论国有企业改革走什么样的路子的時候，就說教育部要放权，但是担心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这个过程虽然企业改革有很多问题，但还是走在了前边。

这样就促使政府治理改革。金融危机以

中国决策机制如何广纳民意

■ 王一江 长江商学院教授

中国人的创造力是没有问题的。中国人已经生存了几千年，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没有一个问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三十年的时间，他们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把一个贫穷的国家变成全世界最强大的制造业基地，这都表现出中国人的创造力很强，这个中间无论碰到什么困难，他们都能找到办法，这是我要讲的关于中国人的主要观点。

而且我还要强调一点，中国人取得的所有成绩在过去三十年里面，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对共产党要有一个足够的认识。中国人的精英，相当大的比例，或者说最大的一个比例是在共产党里面，所以共产党是一个非常能力的党——可能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在世界上的政治组织中间是没有其他的党可以比拟的。那么，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人创造力没有问题，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中国人天生的创造力，还有中国共产党具备的管理能力，是我们对东方、对中国最有信心的主要理由。

中国问题可能会出在哪里？中国问题可

列的活动系统构成的，这是一个定义。

我们从这四个方面看中国模式。第一点就是价值承诺。如果你看我们国家或者政府对老百姓的承诺，其实跟西方是没有区别的。我们照样说人权平等，照样说产权受到保护，照样说为人民服务，照样说执政为民……价值承诺我认为比西方讲得还好，或者说是世界上最好的承诺。这是第一。

第二，看中国模式的制度定位。制度定位主要是人权、产权，人权是不是平等的，你必须要定位。产权也要给一个定位，是给它界定清楚，保护还是不保护？

第三，就是权力限制问题。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哪里？是来自上层还是下层？必须给它定位。

第四，权力之间应不应该制衡，是制衡还是不制衡？

这四个定位就决定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约束，你要一个模式必须有制度约束。中国的财富创造战略和财富分配战略，就是在这个制度框架里才得以实行。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模式，财富分配战略，在很多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制度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在权力定位里，第一有特权——人权不是完全平等的，界定也不清楚。第二产权我们界定不清楚，也没有保护。第三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上层而不是下层。第四，我们界定的权力不制衡。这种制度定位就给我们第三大战略创造了条件，第三大战略就是财富创造战略。有几个特点，主要是政府投资拉动需求，需求拉动主要靠投资。政府通过高税收、高税费，把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上，然后用财政投资和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这种拉动经济如果没有前面的制度基础是不可能的。凭什么收这么高的税，老百姓不让收。如果人权产权都不受保护，他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有了这个前提才可以有政府投资发展战略。

第二，出口拉动。中国过去的十几年，出



后，国际治理出现大问题，我们在外面出了力，花了钱，但得不到认可，感觉很冤枉，这就是国际治理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个正确的治理理念。现在市场化已经确定了，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治理观，才能统揽。从企业治理到非盈利组织治理，到政府治理，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现在我们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它还没有找到一种良好的决策机制来使自己避免犯过分具有破坏性的错误。

能会出在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强有力的组织，它的决策如果发生错误，那么对整个社会就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性的影响。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发生过。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现在我们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它还没有找到一种良好的决策机制来使自己避免犯过分具有破坏性的错误。

现存的决策机制应该说有两个主要的弱点。第一就是它的随意性。因为中国总体来讲，还是一个集权的体制，无论是市一级，还是县一级，还是高级一些的决策层次的一把手、党委书记有过多的权力。所以一个人的决策可以导致重大决策的正确或者不正确。

第二，就是他唯上不唯下。这个组织是一元化的，下级官员都是上级官员任命的，



口拉动在经济成长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出口拉动也有一个前提，就是最低工资。就是说只有这些优势，我们才可以跟别人竞争。所以有经济拉动，第一是投资拉动，第二是出口拉动。

第三就是城市化。这个城市飞速扩张，实际上就是把农村土地、老房子、棚户区进行改造，变成框架。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我们中国模式也是走不通的。

另外，财富的分配战略。一般来说我们要翻一番，要达到小康水平等等，这个就把普通居民的收入，通过高税收高税费变成了国家资本，然后再进行投资拉动，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财富分配战略就是这么一个战略。国家的投资占了GDP的24%，还有国家与社会资本没有算在里面，也就是大约有60%的GDP被政府和国家花掉了，留下的只有40%给所有的民营企业 and 老百姓。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内需是疲软的。还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就是中国的这种分配制度除了政府拉动大部分以外，政府拉走的部分通过其他的途径转化成全国资本。按照这个道理财富收到国家，由国家投资，可以做国家资本主义。如果这些资本从国家流到权贵手上，又从国家资本转化成权贵资本，那就是权贵资本来发展经济，这

到跨国治理。而治理第一个要素、第一个理念就是多元化，必须尊重各利益相关者。比如，央企搞改革，设了董事会，如果不行，就要改成多个股东，所以总体上必须多元化。

我们现在都是一元化的思维，都想代表一切，都想找个一把手，所以我们不仅在国内



所以他决策的时候都在想：我的什么决策能让上面高兴？而教育能不能好好发展，环境能不能有效保护，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诉求能不能得到良好的满足等问题，在一把手的决策机制中，往往是考虑得比较少。这个问题现在传递出来的比较好的消息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也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在十八大会议上反复强调，要以人民群众的意愿，作为我们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所以下一步关键是怎样在党的决策机制中让群众来参与。



种权贵资本的经济就变成权贵、贪官、奸商聚集了大量财富，普通老百姓赚得很少，中国极少数人占了中国极大部分的财富。这四大战略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要素。

另外，又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内在规律、内生矛盾？由于我们的经济定位在权力控制经济，中央集权的权控经济导致了所有的生产要素、所有商品和资源进入市场之前，必须要受到集权的批准。如果没有权利允许你是进不了市场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管制，不管你是要拉项目，还是做别的，都需要进行批准，都有管制。所以，这就造成了官员的贪污、权钱交易。官员的贪污、权钱交易是中国模式的第一规律，它的价格配置资源是第二规律。第一规律就是贿赂价格配置资源，谁的贿赂价格高就流向哪里。这个权钱交易的模式就使得有权力的权贵得到巨大的财富，还有奸商也可以得到财富，贪官也得到财富。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就变成一个权贵资本，就以老百姓的成本获取自己的利益，这是第一个矛盾。

最后怎么改革？放权，把控制资源的权利放到老百姓那里去，叫做返还民权——本来这个权力是老百姓的，现在返还给老百姓，没有民权就没有民智，没有民智就没有民想。

治理搞不好，出去也不行，出去为什么屡屡失败？我们的企业出去收购，要经过演练以后，才能适应多元化。

第二，组织治理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顶层设计。无论政府还是国际组织，无论企业组织还是非盈利组织，主要决策者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顶层设计。比如，搞公司的，就得先设计章程和股权结构，如果这个不做，别的做了，那就是抓小放大了。有人认为，顶层设计就是一个系统设计，那么有人又提出顶层设计怎么做？所谓顶层设计就是不论哪一层的决策者，别人做不了，只有你能做基本游戏的制定。

第三，治理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次性行为。现在错就错在这儿，只要你有组织，今后管理和治理就对应。现在有很多地方也搞治理，也搞设计，搞完了改成办公室又取消了。包括我们海外上市公司，为什么上市以后，被人家打官司诉讼，就是这个问题。

公司治理或者治理，以前的政府统治为什么不用统治政府，政府是强制性的，现在统治都不用了，用多元化、民主化，只能叫治理。治理有强制理念，有疏导的理念，但我们现在不大用疏导，光用强制性。所以，中国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要树立正确的治理理念。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中国从政府到企业，再到非营利组织参加国际游戏规则。

外汇管理体制成为宏观调整的重要因素

宏观调控政策如果要取得更大的成功，那么调整外汇管理制度，特别是逐步推进汇率的浮动化，应该是一个必由之路，是一个必要的选项。

■ 姚东旭 首都经贸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教授

我们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经常被忽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事实上已经走向了开放，正逐步具备开放经济体的特征。从加入WTO以后，开放度越来越高，在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之后，宏观调控中原有的一些做法已经表现得越来越落后，比如，外汇管理体制就已经成为宏观调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也可以把外汇管理体制视为货币政策的一个方面，但我更愿意理解为一个独立的方面。

大多数人担心，推进货币的浮动化，如果人民币升值，会影响出口；人民币升值如果上升，会使我们的外汇储备缩水。我觉得后一个观点实际上完全没有道理。美元对其他货币，或者美元的均值下跌，确实会使我们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缩水，但是这不由我们决定。美国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必定使美元走软，所以一定会缩水，这是历史积累下来的问题，跟人民币兑美元升不升值没有关系。如果外汇储备以人民币为标值，显得缩水了，这个不是问题。剩下另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汇率上升影响出口。从目前来看，实际上从2005年汇改以后，对出口的影响不大，大多数时候我们出口的萎缩都是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不是跟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有关系，事实上也不值得担心。我们中国的这种出口结构，出口处在产业链的低端，我们的利润操控在别人的手中，大多数时候是这样。

从最近几年宏观调控的情况来看，我们发现由于忽略了开放型的特征，所以大多数时候的调控并不成功。从2006年开始，以控制通货膨胀的调控为主，并不成功，2009年的这一轮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成功的。我们发现，凡是使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的，成功概率比较大，而货币政策大多失败。其实从道理上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因为我们已经逐步具备了开放特征。那么，开放条件下，独立政策、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制，三者不可兼得。从这个制度上来说，我们还不能实现可自由兑换。但是，事实上已经是比较自由了。如果从实际的经济运行情况看，已经非常高了，再维持汇率的相对固定（凡是使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最终大多会有影响）。如果说人民币的升值导致大量的产业从中国向外转移，这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问题，如果仅仅是出口下降，则更多地是外部环境的影响。

宏观调控政策如果要取得更大的成功，那么调整外汇管理制度，特别是逐步推进汇率的浮动化，应该是一个必由之路，是一个必要的选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觉得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